

东北亚政治与外交

从“专守防卫”到提升“反击能力”： 日本安保战略的质变与影响

吕耀东 王方

[摘要] 日本政府曾长期奉行“专守防卫”的安保政策,但随着日本对外关系的变化及其国家战略目标的调整,日本政府从防卫范围、防卫对象、防卫力量等方面逐步将“专守防卫”调整为积极主动的防御政策,直至在推进落实“反击能力”的过程中将自卫防御型的“专守防卫”政策最终转向为自主进攻型的防卫战略,彻底推翻“专守防卫”。这样的战略转向不仅在于体系结构层次,还在于国家层次,即突破基于“和平宪法”的“专守防卫”原则,改变“战后体制”,谋求政治及军事大国化。日本对华错误认知将加剧中日两国间的紧张关系,进而危及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关键词] 日本;安全保障战略;专守防卫;反击能力;安保三文件;中日关系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654/j.cnki.naf.2024.04.001

[文章编号] 1003-7411(2024)04-0003-(14)

[收稿日期] 2023-09-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0FJB00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十四五”重大项目(22JJD810033);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2023RBSB01)

[作者简介] 吕耀东,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二级研究员(北京 100007);王方,华北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廊坊 065201)。

“专守防卫”在日本官方《防卫白皮书》(1970年)中表述为,“只能用最低限度的防卫力量在日本领土内进行防御性作战,不能拥有进攻性武器,更不能对他国实施先发制人的攻击”。但与“专守防卫”相矛盾的对敌“反击能力”诉求,却成为日本政府2022年12月16日出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備计划》(下文称“安保三文件”)中的核心关键词。其要义为,日本将发展可对敌方导弹基地发起直接攻击的“反击能力”,这一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日本安保战略发生了“质”的转变——转“守”为“攻”。日本国内关于是否能够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讨论由来已久,在现行《日本国宪法》第九条持续受到冲击、大国战略竞争

日益加剧的国内国际双重背景下,关于“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改版的“反击能力”的论争更是存在争议,其中不乏否定性的论断,又或者在具体领域为其寻求合理化的法理解释。事实上,大多数论争的背后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基本问题,即日本安保战略从“专守防卫”转变为提升“反击能力”的实质。有鉴于日本拥有“反击能力”对全球和地区带来的深远影响,特别是对东北亚地区安全环境的重大冲击,有必要以此探析日本安保战略发生质变的原因及过程,分析研判其实质。

一、“专守防卫”的转型:日本“安保三文件”所反映的安保战略质变

日本战败后制定的“和平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作为国家主权发动战争、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在此“和平宪法”限制下,日本长期以来奉行“专守防卫”政策,将防卫力量的建设维持在最低限度的范围内。尽管“安保三文件”中仍保留了“专守防卫”原则,但随着日本对外关系的变化及其国家战略目标的调整,日本的安保战略事实上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一)日本安保战略变化聚焦对敌“反击能力”

2022年12月,岸田文雄政府基于“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理念,将建立对敌基地“反击能力”写入新修订的“安保三文件”。其中,建立对敌基地“反击能力”成为“安保三文件”的核心指导方针,其将改变二战后日本安保战略“专守防卫”的本质,并对今后日本外交、安保政策及其实施产生重大影响。事实上,日本借“反击能力”之名谋求军事扩张的动作由来已久。

日本力图突破“专守防卫”建立“反击能力”,一直存在是否违宪及其界定问题。早在1956年的日本国会答辩中,防卫长官船田中代为宣读首相鸠山一郎关于“反击”问题的答复:“在国家领土受到导弹攻击等侵犯的情况下,‘不能认为宪法的意图是让我们坐等自我毁灭’,只要没有其他自卫手段,用导弹等攻击敌人基地属于自卫范围”。^[1]此后,日本政府一贯坚持“‘反击能力’在宪法上是被允许的,但作为一项政策决定,采取不建立‘反击能力’这一立场”。^[2]

直到2015年安倍晋三执政时期完成了日本能够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安保体制”后,为后续安保政策建立“反击能力”提供了前提条件。2020年9月11日,安倍晋三发表了探讨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反击能力)”的“总理大臣谈话”。其后的菅义伟将探讨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反击能力)”提升至内阁决议的高度。经过执政党、政府内部的持续审议后,将“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改为“反击能力”。岸田政府明确了日本建立“反击能力”,并且写入2022年底修订的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之中。正如前防卫事务次官岛田和久所言:日本明确建立“反击能力”正是安倍晋三、菅义伟和岸田文雄三个内阁之间接力的结果。^[3]岸田推出的旨在提升日本“反击能力”的“安保三文件”,事实上终结了战后以来一直奉行的“专守防卫”政策。

(二)日本“专守防卫”与“反击能力”之辩

美国在二战实现对日本的单独占领后,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在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主导下出台的“和平宪法”于1947年5月3日正式施行。其中第九条明确规定了日本放弃战争、不维持武力、没有交战权和宣战权。但随着美苏冷战的开始以及朝鲜战争的爆发,日本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开始上升,在美国的认可下,日本成立了自卫队,依照“和平宪

法”奉行“专守防卫”的政策。

“专守防卫”随后在日本政府防卫性政策文件中得到进一步扩大性解释。1970年,日本政府发布了战后首份《防卫白皮书》,首次在日本政府的官方文件中提出“专守防卫”这一概念,并较为清晰地界定了日本的“专守防卫”政策,即“日本在遭受侵略时,通过发动自卫权这一国家固有的权利,来贯彻战略守势,从而维护日本的独立与和平。防卫力量的大小、武器装备的配置、遭受侵略时采取何种程度的行动等必须限定在自卫的范围之内。”^[4]具体包括:“第一,防卫力量以自卫为目的,其规模也限定在自卫所必需且相当的程度上,远程轰炸机、攻击型航母、洲际弹道导弹等能够对他国造成侵略威胁的武器均不得使用。第二,不能采取超越自卫范围的行动。只有当日本遭受直接或间接侵略时,才能出动自卫队,不能实施所谓的‘海外派兵’。第三,在核武器方面,采取‘无核三原则’的政策。第四,日本的防卫力量建设应以国力国情为基准,在自卫所需的必要限度内,与社会保障、教育等领域协调推进,渐进式发展有效的防卫力量。”^[4]可见,当时“专守防卫”是“在遵守宪法的基础上,贯彻国土防御”^[5]的防卫政策表述,日本只能拥有最低限度的防卫力量,不能拥有进攻性武器,更不能对他国实施先发制人的攻击。但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日本政府一直在不断模糊“专守防卫”的概念,从防卫范围、防卫对象、防卫力量等方面逐步将“专守防卫”调整为积极主动的防御政策,直至在推进落实“反击能力”的过程中彻底推翻“专守防卫”。

事实上,日本国内围绕“专守防卫”与“反击能力”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及倾向,“是维护宪法、重视国际协调,还是修改宪法、增强军事力量、成为政治军事大国”;^[6]是坚持具有自卫性质的“专守防卫”政策,还是推进具有进攻性质的“反击能力”构建。对此,日本国内争执不休,其中涉及到“反击能力”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日本是否应拥有“反击能力”,二是“反击能力”是否违反了“专守防卫”原则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对于日本可否建立“反击能力”政策的态度,日本右翼势力、“修宪派”与“护宪派”观点相左。大多日本自卫队及防卫省高官认为日本建立“反击能力”并不违反“专守防卫”原则。日本海上自卫队前幕僚长河野克俊认为,“日本仍根据‘专守防卫’原则遏制自卫队的进攻能力,但一个国家只有在同时具备攻、防能力时才能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如果日本一直处于负责‘盾’而把‘矛’留给美国的境地,那么当出现美国无法立即应对的突发事件时,日本便会束手无策。一个主权国家有责任同时拥有‘盾’和‘矛’的能力,并建立一个万全体制来保护其国民。日本如果不具备‘反击能力’,就等于放弃了政治责任。”^[7]前防卫大臣石破茂指出,“拥有‘反击能力’并不意味着日本走上大规模军备扩张的道路,在朝鲜弹道导弹技术和能力不断提升的情况下,日本需要做好军事准备予以应对。”^[8]陆上自卫队前幕僚长岩田清文和前防卫事务次官岛田和久也均认为,“‘反击能力’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应有的权利。”^[3]日本防卫副大臣井野俊郎出席众院外务委员会会议被问及“反击能力”的行使方式时称,没有排除选择同时发射多枚导弹的“饱和攻击”的可能性。^[9]

日本自民党、公明党、维新会等“修宪派”也对建立“反击能力”持肯定论断。在2021年10月日本第49届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竞选纲领明确提出应建立“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反击能力)”,略过了是否应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反击能力)”的探讨步骤,直接强调“应从根本上

提升日本的防卫力,推进包括拥有拦截对手弹道导弹的防卫力等新举措”。日本自民党政调会长萩生田光一强调,“在世界安全保障环境发生剧变的当下,朝鲜频繁向日本附近海域发射弹道导弹,以及台海紧张局势加剧。针对上述行为,如果仅仅只是抗议,无法保护日本国民的生命安全,必须通过建立并增强‘反击能力’来提高日本的威慑力。”^[10]日本维新会表示“有必要拥有‘反击能力’,以作为威慑阻止敌方领土内的导弹发射和其他行动。”日本国民民主党对拥有“反击能力”持积极态度,认为“从提高威慑力这一层面来看,有必要拥有在敌方境内拦截和阻止导弹的能力”。^[11]公明党虽持审慎态度,但党内部分成员却持相当积极的态度。如公明党副代表北侧一雄表示,“日本拥有‘反击能力’将会有更强大的威慑力,使对方的攻击犹豫不决。防御性防卫是我们的基本前提,我们绝不会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在坚持这一理念的同时,拥有一部分反击能力并不违反宪法”。^[12]公明党的外交安保调查会长佐藤茂树也称,即使拥有“反击能力”,也“必须讨论如何确保专守防卫、必要最小限度的措施”。日本维新会的众议员青柳仁士表示赞成拥有“反击能力”,还暗示应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国民民主党前原诚司主张,不仅是对敌国导弹基地和司令部的攻击,还应讨论持续战斗能力。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会长小野寺五典响应称“持续战斗能力很关键”,提及武器和弹药储备的重要性。^[13]

但是,日本“护宪派”及部分在野党普遍认为建立“反击能力”会推翻“专守防卫”原则,对为“反击能力”寻求合理化、法理解释的言论予以否定。前外务省审议官田中均对拥有“反击能力”予以批评,并重申了外交的重要性。他认为“日本保持低水平的国防开支以避免成为军事大国,这一直是其他国家日本的放心来源。拥有‘反击能力’并不能增强威慑力,日本应该通过经济和外交等手段,与美国等友好国家合作,以加强‘综合威慑力’”。^[14]前内阁官房副长官助理柳泽协二表示,“‘专守防卫’原则传达了不会对别国构成威胁的含义,这是一种让别国没有理由攻击日本的防御策略,而拥有‘反击能力’将会破坏这一防御策略,不仅不能守护国民生命安全,而且还会增加日本陷入战争的风险。”^[8]在野党令和新选组表示,“如果拥有‘反击能力’,便可视为日本准备战斗行动,这是一个‘愚蠢’的措施,不仅会使周边地区的局势更加紧张,也会使日本处于危险之中”。立宪民主党认为,“‘反击能力’不仅存在脱离‘专守防卫’原则的风险,而且若没有与美国相匹敌的打击能力,将无法发挥威慑作用,因此应慎重讨论”。日本共产党表示,“一旦许可拥有‘反击能力’,日本将发生大规模军备扩张活动,与政府一贯主张的‘专守防卫’原则相悖”。^[3]

综上所述,日本政府通过渲染“周边威胁论”“中国威胁论”,最终在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以“自卫”为借口摧毁他国疆域内导弹基地等的“反击能力”。尽管日本“护宪派”及部分在野党对“反击能力”的违宪行为予以反对,但因在政治上的弱势地位,无法改变日本政府将“反击能力”写入了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的现实。

(三)日本安保战略的质变

日本新版“安保三文件”实质性冲击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中“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的规定。新版“安保三文件”内容表明日本安保战略已发生质变——转“守”为“攻”。

第一,引入了所谓的“反击能力”,使日本实际拥有攻击能力。根据新版“安保三文件”,日本将在五年内生产延长射程的国产12式反舰导弹,并购买射程约1600公里的美制“战斧”巡航导弹。“战斧”巡航导弹等具有作战能力的进攻性武器,超出了日本固有防区,拥有摧毁他国疆域内导弹基地等进攻能力,这实际违背了日本“和平宪法”规定下的“专守防卫”方针。此外,还提出要致力于加强日本自身经济实力、技术实力以及外交和防卫能力,包括研发、购买更具攻击力的高精尖武器装备,将增强“反击能力”上升为安保战略。有日本专家评论,新版“安保三文件”决定可以说是日本放弃“专守防卫”,行使集体自卫权,向他国施加威胁的军事大国的历史性转变,日本将成为煽动国际冲突的根源。^[15]

第二,强化同盟对华施压,透露强烈的对华针对性。新版“安保三文件”将中国定位为“迄今最大战略挑战”,将中国台湾地区定位为“与日本共享基本价值观的重要伙伴和朋友”。这与美国在2022年10月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将中国定位为“美国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挑战”相契合。该文件作为加强综合防御体系的措施,主张推动以下四个领域发展:研发、公共基础设施发展、网络安全以及与志同道合国家的国际合作。此外,日本政府还将考虑审查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针等制度。在海上保安能力方面,日本提出在做好钓鱼岛周边警备的同时,加强海上保安能力以及海保和自卫队的合作。以上动向均是日本为突破基于和平宪法的“专守防卫”、发展“反击能力”、强军扩武寻求所谓正当性。有日本专家指出,日本政府采取的包括“台湾有事”在内的对中国包围手段,加剧了东亚地区的军事紧张局势。新版“安保三文件”无疑是日本的防卫政策与美国的对华战略一体化。文件以“自卫队及驻日美军能够在平时无缝、有效地活动”为目标,露骨地反映出对美从属、缺乏自主外交政策的本质。^[15]

第三,扩大军费支出,从根本上强化防卫力。日本提出到2027年把防卫费的GDP占比从约1%提高至2%以上。新战略中规定的2%的目标,以及日本防卫计划中提出的五年支出43万亿日元(约合3150亿美元)的计划,将使日本的军费达到北约的标准。对此有日本专家严厉批评称,通过增税和发行国债来填补日益膨胀的军事预算的财源,是放松战争束缚的暴行。尤其是将重建特别所得税挪用为防卫费令人愤慨。国防开支异常增长,将对医疗、社会保障、教育等财政支出造成压力,对广大公民的生活造成严重影响。而且,全国力量的调动,将带来日本整体国策的重大变化。^[15]在安全核心的国防政策方面,随着“日本周边的安全环境迅速变得更加严峻”,政府将“从根本上加强其防卫能力”并“通过整合国家力量来加强国家的防卫体系”。通过日美同盟以及“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进行联合威慑和应对。“从根本上增强防御能力”的措施包括防区外防御能力、防空反导能力、无人资产防御能力、跨域作战能力、指挥控制信息相关功能、机动部署能力、持续性和强韧性七大支柱。文件还表示日本政府将根据《土地管制法》对军事基地周围的自由空间进行监管之外,还要求“随时使用海上空域和无线电波”,将海洋和空域纳入其中监管范围,甚至地方政府和行政部门也将纳入整个安保体系。这种为了军事目的而全面动员国家力量的行为,是向极权主义的发展。^[15]

第四,全面利用经济安保法强化防卫体制。根据新版“安保三文件”,日本政府着眼于经济安全保障的同时,重点致力于防务生产和技术基础的维持和强化。文件强调,维护国家的

经济安全是确保整体国家安全的重要一环,呼吁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以确保国家的整体安全,包括军事、经济、社会和技术层面。日本推出综合性的安全保障战略,旨在依靠日美同盟、加强自身防卫能力,并通过非军事手段在安全领域发挥与世界经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独特作用。新版“安保三文件”还决定“积极将包括经济安全保障关键技术培养计划在内的政府研究开发相关资金及其成果用于安全保障领域”,“促进包括学术界在内的尖端研究人员广泛参与”。日本政府强化人工智能(AI)及量子等供应链和尖端技术的官民合作,其实质是将科学、技术以及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卷入安保政策,回归到动员科学家等推进军事技术开发的扩军政策的“老路”。

总之,日本强势推动安保战略和防卫政策调整,积极谋求建立“反击能力”、渲染“中国威胁论”、增加军费开支,以及全面利用经济安保法强化防卫体制,这意味着日本当前的“专守防卫”政策发生重大转向,开始从“守”转向“攻”。而这一转向的实质反映了日本更大的战略图谋,不仅意图进一步突破和平宪法禁锢,实现军力向外扩张,而且还希望以此提升日本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为未来介入全球事务、实现军事政治大国目标铺路。作为发动过侵略战争的国家,日本通过大规模扩军和否定“和平宪法”第九条来威胁邻国,无疑会加剧地区军事紧张局势。

二、突破“专守防卫”建立“反击能力”是日本安保战略质变的落脚点

在日本现行《日本国宪法》第九条持续受到冲击、大国战略竞争日益加剧的国内外变局下,日本国内关于“是否要拥有‘反击能力’”“是否违反现行《日本国宪法》与‘专守防卫’原则”“是否有利于防卫日本安全”的争论,与日本安全保障战略调整有直接关联性。不论是为拥有“反击能力”寻求合理化解释的积极论调,还是否定“反击能力”的观点,都是日本安全保障战略调整、确立过程的具体表现形式。

(一)有关“反击能力”的要义及实质

“反击能力”是日本力求突破“和平宪法”第九条限制推进“政治军事大国化”进程中所形成的、新的特有概念。“反击能力”一词的前身是“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关于“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讨论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已有较多研究成果,对此本文不再赘述,而“反击能力”作为近年新提出的概念,相关研究尚不多见,是为本文所分析的主题。

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国内有关将摧毁敌方导弹发射基地等设施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讨论再次成为热点话题。日本有专家认为“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一词过于敏感,可能会在国际社会上受到他国质疑,故建议将“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更名为“反击能力”,这一建议得到了执政党自民党的认可和采用。2022年4月21日,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向岸田首相建议将“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改称为“反击能力”并拥有该能力。^[11]日本政府在2022年12月16日出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正式将“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表述为“反击能力”。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将其定义为:“当日本遭受他国弹道导弹等武器的武力袭击时,基于‘武力行使三条件’,可采取防止上述攻击所需的不得已的、必要最小限度的自卫措施,使用防

区外打击能力在对方疆域内进行有效反击。通过拥有施加这种有效反击的能力,以遏止武力攻击。”^[16]2023年版《防卫白皮书》将“反击能力”进一步表述为:“不仅利用导弹防御网防止来袭的导弹,而且防止敌方进一步武力攻击,予以有效反击的能力。以此让敌方放弃攻击念头,从而阻止武力攻击本身”。^[17]有观点将“反击能力”等同于“防区外防卫能力”,^[18]认为“反击能力”是综合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IAMD)的重要构成部分之一,而IAMD概念的构成要素之一即是“对敌方策源地的攻击作战”,日本拥有“反击能力”恰恰填补了这一空缺要素。^[19]有日本学者为了淡化其极具攻击性的本质称:“反击能力”并非对对方国家的报复性攻击,^[20]而是一种防止对方弹道导弹攻击的远程自卫措施,行使该能力的要求与自卫队使用常规武力的要求相同。^[2]但是,“反击能力”的危险性也正在于会以“自卫”的名义引发战争,譬如“如果B国对与日本关系密切的A国发射导弹攻击,当A国要求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对B国进行弹道攻击时,即便日本并未受到B国攻击,那么日本也会使用“反击能力”对B国发射导弹攻击,从而爆发战争。”^[21]由此,笔者认为“反击能力”作为日本提高防卫力的重要手段,是指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都能够通过配备防区外导弹等战略性攻击武器来加强日本的军事威慑与军事对抗的战争力量。既是日本在安全事务上从美国的追随者向引导者姿态转变的具体体现,也是日本实现军事大国化的重要一环。

(二)“反击能力”与“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相关性

为避免“违宪”“先制攻击”等可能出现的国内外舆论批判,日本政府在“安保三文件”中正式将“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表述为“反击能力”,其本质并无不同,均是强化日本自身防卫力的手段、是日本实现军事大国化的阶段性战略意图(目标)体现,但在词义范围上存在一定差别。

从广义上看,相比“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反击能力”的涵盖范围更广。若想达到“安保三文件”中规定的“有效反击”,就意味着“反击能力”的攻击对象不仅仅是固定的敌方导弹基地,而且还扩大至包括基地设施、军队司令部、政府相关机构在内的指挥控制系统。^[21]从狭义上看,“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强调攻击性,指的是“歼灭敌对国家的军事力量”,^[22]而“反击能力”重点是反击,意在强调出于自卫的受害者身份。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条四项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中不得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害他国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会员国有义务采取不会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正义的和平方式,去解决它们之间产生的冲突。^[23]因此“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有“先发制人”之嫌,违背国际法规定,故日本政府谋求将本质相同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一词变更为“反击能力”。《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规定“当一会员国受到武装进攻时,可以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权”,^[23]虽然“和平宪法”否定日本的集体自卫权,但是,安倍执政时期曾对集体自卫权进一步做出解读,允许日本有条件地行使集体自卫权。日本政府以此作为行使“反击能力”的依据,以逃避国内外舆论谴责。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会长、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于2020年9月表示,大部分国民不希望日本发动“先制攻击”,而“反击能力”一词更能直接表达保卫国家所需的必要能力,并且易于国民和海外人士理解。^[24]正如日本共产党书记局局长小池晃所言:“自安倍政权以来,日本政府一直擅于通过改名的做法来欺瞒

国民。”^[25]可见,将“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更名为“反击能力”,是在用表面上温和的措辞谋求更大范围的军事攻击力。

(三)“反击能力”与“专守防卫”的矛盾性

从日本国宪法及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反击能力”与“专守防卫”是两个相互对立的概念,“拥有对敌基地的‘反击能力’事实上等于‘专守防卫’的失效。”^[26]

日本政府对拥有“反击能力”的解释是,出于自卫对发射针对日本的导弹的敌方基地进行打击,并不违反宪法规定的“专守防卫”原则。2022年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指出,1956年2月29日,日本政府关于“为防御制导导弹等的攻击,只要认定没有其他手段时,打击来袭制导导弹的基地,在法理上是属于自卫范围的”的解释符合“武力行使三条件”下所采取的自卫措施,此次明确拥有的“反击能力”在满足上述理念及条件下可以行使。^[16]日本政府认为“反击能力”不会在本国宪法、国际法范围内改变“专守防卫”的理念,而只有满足“武力行使三条件”才能行使,在未发生武力攻击阶段不允许实施自己率先攻击的“先制攻击”。^[16]但是日本政府对于宪法随意解释并不能为‘反击能力’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提供担保,^[27]其所援引的宪法依据是错误的。^[21]根据国际惯例法中现行关于自卫的“卡罗琳原则”,^①在被打击对象做出合法自卫反应之前,必须有人先采取行动,且以明确的侵略性方式进行。但事实上,由于难以确定发生攻击的时间点以及其他国家是否最终会发射导弹等因素,很难区分日本的“反击”是出于自卫的预防性行动还是先制性行动。事实上,即使“觉察到的威胁、预料到的威胁,或者隐约预感到他国或许察觉到你可能预料到他有可能会把你当作威胁”三种情况下出手,^[28]也很难界定是否是出于自卫。并且只有当冲突乃至战争发生后,方可确定日本是否是“反击”了正确目标,一旦被认定为是错误目标,也就必然表明日本的“反击”是“先制攻击”。^[29]正如马斯洛(Abraham Maslow)的“锤子定律”(The Law of The Hammer)所言,“当你手里有一把锤子,那么你看全世界都像钉子。”当日本拥有“反击能力”后,即使只有细微的迹象表明威胁正在迫近,无论是否有证据表明攻击、是否会真实发生,日本都可能会采取所谓的带有自卫性质的“先制攻击”。“一旦当这样的集体思维定式盛行时,证据将会让位于预感、直觉,如果这些直觉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就会带来悲惨的后果”。^[28]因此,拥有“反击能力”意味着存在“先制攻击”风险,而“先制攻击”意味着日本确实会主动挑起冲突乃至战争。^[30]

可见,“反击能力”正在一步步架空现行“和平宪法”所规定的“专守防卫”原则。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关于“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论争一直未果,2022年“安保三文件”中提出的“反击能力”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论争的结果。但无论是“对敌基地攻

① 1837年,英国殖民地加拿大发生叛乱,几百个叛乱分子占据了位于加拿大境内尼加拉河中的海军岛,并雇佣美国籍船舶“卡罗林号”运输武器到该岛。加拿大当局获悉这一情况后,立即派遣一支英国军队渡河进入美国斯洛赛港,捕获了“卡罗林号”,夺去船上的武器,将该船烧毁并造成数名美国人伤亡。美国政府得知此事后抗议英国侵犯了其主权,而英国辩称这是自卫所必需的。美国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坚称,英国的行为并不是自卫行动,“自卫只有在迫在眉睫的、在必要性上具有压倒性优势、无其他办法可供选择、无时间从长计议的情况下才是正当的”。这一观点最终被国际惯例法采纳。

击能力”还是“反击能力”，均是日本不断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加速推进“政治军事大国化”步伐所找寻的看似合理化的托辞。

三、日本构建“反击能力”的战略考量

日本政府成功将以“自卫”为理由的“反击能力”写入2022年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是“潜在敌意—威胁制衡—敌意合理化”的现实主义冲突理论的政策化过程。这意味着在日本政治右倾化下的安保战略已经发生“质”的变化，表明日本的防卫政策已突破现行《日本国宪法》第九条规定的“专守防卫”原则。“反击能力”作为2022年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的关键概念和日本安保战略演变过程中的核心要素，既是日本在安全事务上从美国的追随者向引领者姿态转变的具体体现，也是日本实现军事大国化的重要环节，将对日本的安全政策走向产生深层次影响。

第一，“反击能力”强调“必要最小限度”反击，实则全方位拓展防卫安保战略布局。一国决策者经常使用的、伪装真实意图的做法，是故意对自身的真正目的轻描淡写。^[31]正如日本在2022年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指出，日本拥有的“反击能力”是“必要最小限度的自卫措施”。^[16]其中就刻意淡化自身对“防卫力”的追求，字里行间均强调日本是因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不得已而为之地采取“必要最小限度”反击。根据现行《日本国宪法》第九条“不保持战力”的规定，日本之所以能够拥有自卫队，是基于“‘自卫所需的必要最小限度实力’并非‘战力’”这一解释。^[32]这里突出强调即使是被攻击后的反击也要做到“必要最小限度”。对此，日本有学者表达异议称：“如果宣布只进行‘必要最小限度’的反击，日本就没有办法提高其威慑力”。^[7]事实上，正是“必要最小限度”这一难以界定的概念给了日本安全政策调整以无限的灰色地带。譬如，2014年初安倍政府解禁了集体自卫权，理由就是“由于安全环境的变化和其他因素，即使是别国对另一个国家的武装攻击实际上也可能威胁到日本的生存，因此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控制在‘必要最低限度’”。^[33]此后，日本防卫费多年连续增长，2023年岸田政府更是设定到2027年5年内将防卫费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的目标，向集体安全的政治军事组织“北约标准”看齐。日本将“出云”号护卫舰升格改造为攻击型航母，计划到2027年购买约500枚美国“战斧”式巡航导弹等行使“反击能力”的军事装备，过去坚持的“专守防卫”原则实际上已成“一纸空文”。

第二，以“反击能力”激发冲突，制造“乌克兰危机东亚化”话题，提升日本“防卫力”。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乌克兰危机东亚化”的言论制造事端，欲将危机引到东亚。2022年6月10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第19届亚洲安全峰会上，岸田文雄在主旨演讲中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已经发生，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能‘隔岸观火’”。^[34]在2022年版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强调，俄罗斯加强在包括日本在内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对外军事活动，加之与中国的战略合作，是日本安全保障上的强烈担忧。因而，需要从根本强化作为安全保障的日本“防卫体制”和“防卫力”。^[16]2023年3月26日，岸田文雄首相在防卫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再次渲染威胁称，“今天的乌克兰，可能就是明天的东亚”。并不失时机表达

了冲突的可能性,他强调“我们的周边国家和地区,由于核和导弹能力的加强、军备规模急剧扩大,试图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越来越明显。”^[35]岸田文雄在2023年5月日本广岛举行的七国集团(G7)峰会上将“俄乌冲突”及应对作为主要议题,强调七国集团拥有共同价值观,应团结合作应对国际社会的关键挑战。^[36]

第三,“反击能力”对地区威胁的渲染,使日本安全政策更具对华针对性。作为“安保三文件”之总方针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强调:“近年来,日本处于战后最严峻复杂的安全环境之中,通过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压力高涨”。提出“作为国际社会主要成员,与同盟国和同志国合作,实现国际关系特别是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新的平衡”。对此,2022年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进一步写明中国的军事动向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应通过综合国力以及与“盟友、志同道合国家”合作来应对。一改2013年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把中国表述为“国际社会的关切事项”、作为“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安全环境与课题”等表述,并罗列了中国、朝鲜和俄罗斯为地区安全的重要影响因素。列举了朝鲜导弹技术和能力急速发展与加强“核战力”的方针,称之为“比从前更严重且迫切的威胁”。^[16]该安保战略强调俄乌冲突是“欧洲方面最重大且直接的威胁”,提及中俄在日本周边开展联合演习等合作,“是安保上的强烈关切”。^[37]可以看出,日本不断炒作其周边所面临着重大安全变局,并称存在“以武力”改变现状的“地区威胁论”,要与同盟国及志同道合的国家共同应对,将一贯坚持睦邻外交的中国推向对立面,可见其对华针对性。未来,日本为强化自身防卫安全,在落实“反击能力”的进程中,将会进一步突出旨在遏制中国的安全政策取向,为日本的军事大国化道路铺平路线。

综上所述,“反击能力”将使日本在安全政策上变得更加具有攻击性。基于“和平宪法”第九条,日本不能拥有军队、不以武力解决国际争端、不以国权发动战争,实行“专守防卫”政策。而“反击能力”及其所装备的攻击性武器,完全背离了现行《日本国宪法》的和平主义精神,彻底颠覆了战后日本的“专守防卫”政策。日本通过炒作、渲染周边威胁论,为拥有“反击能力”、修订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寻找理由,表现出日本保守势力试图“修宪”、以提升“防卫力”谋求“政治军事大国化”的战略图谋。

四、日本建立“反击能力”的重大影响

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强化军事力量,在背离和平的道路上越走越远。2022年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首次将中国定位为“迄今最大战略挑战”,^[16]强调“中国威胁”,可见其对华针对性。岸田首相的“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正是基于这一错误的认知逻辑,通过渲染“中国威胁”,以“自卫”为借口,将“反击能力”写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日本政府打着“自卫”的名义将对敌基地的打击能力包装成“反击能力”,但这并不能掩盖其本质。“反击能力”的攻击性本质以及由此产生的军事扩张倾向,将对中日关系以及地区的和平稳定造成多重影响。

第一,“反击能力”的落实将加剧中日在“台海问题”上的冲突。日本2022年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称,“台湾海峡和平稳定是不可或缺的要害”,日本将“在期待和平解决两岸问题”的

立场下,继续采取各种措施。^[16]作为一个国家的安保战略方针,日本一方面高举“和平主义”的幌子,展现出维护地区和平的良好国际形象,另一方面,又加紧提升对敌基地及指挥系统的“反击能力”,并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中关于台湾问题的承诺,对日本国内一些政客“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言论视而不见,公然干预中国内政,渲染地区威胁论。譬如,日本公然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精神,无视海洋相向国家海域划界的通识与法理,在东海单方面非法划定所谓“专属经济海域”(EEZ),并妄称2022年8月中国向日本西南“专属经济区”海域内发射了“弹道导弹”,表示“地区居民认为受到威胁”,^[18]对华针对性十分明确,表现出日本挟“地区居民”绑架国际社会舆论、误读国际法的战略意图。尽管日本执政党内部表面上未明文写入“中国威胁论”字眼,但是,《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文件通篇文字中皆以“中国威胁论”作为立论基础,已经将中国视为日本及地区安全的危险源。日本借此渲染东海、南海等地区威胁,为构筑“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机制,遏制中国的海洋维权活动。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本应重温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总结维护两国关系发展历程的历史经验,继往开来,但中日关系中敏感的“台海问题”成为《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渲染“地区威胁论”的缘由。随着日本将“反击能力”推进落实在其安保政策之中,中日将因“台海问题”使得两国关系走向更加复杂。

第二,“反击能力”将加速日美军事一体化进程,日益突出其对华针对性,给中日关系带来负面因素。2022年9月14日,日本防卫相滨田靖一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举行会谈,确认了日美同盟的安保战略方向的一致性,日方就建立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反击能力)和大幅增加防卫费等强化防卫力获得了美方支持。^[38]2022年11月26日,日本自民党和公明党在国会内召开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会议时表明“考虑到朝鲜和中国的导弹威胁”,将与美军共享攻击对象相关情报和攻击成果的评估,日美两国会“共同发动反击能力”。^[39]2023年1月,岸田文雄访问美国,并在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的首脑会谈中提出修改规定“日本有事”时自卫队与美军职责分工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改变日本长期为“盾”、美国为“矛”的态势,实现日本为“矛”的攻击能力。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实质是要改变过去美国与日本不对等的同盟关系,推动日美同盟对等化发展。日本渲染地区威胁论调,将会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对华针对性。对此,正如日本学者所言,“日本战后体制的核心是改变‘专守防卫’,通过拥有‘反击能力’以强化日本的安保能力,以此强化日美同盟,应对中国。”^[26]可以看到,近年来,日美军事同盟在东亚周边海域不断开展军事演习,给东亚地区的安全带来了不确定性。此外,渲染“周边威胁”,也是日美维系军事同盟继续存在的理由和借口。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不复存在,作为特殊历史产物的日美同盟本应消失。但是,日美一直在东亚重新建构所谓的对手和“敌人”。日美标榜“日美同盟是东亚地区和平稳定的基石”,但事实上,东亚地区的不安定、不确定,很大程度上源于日美军事同盟的存在。未来,随着日本防卫实力的不断上升,其攻击性将日益显现,随之强化的日美军事同盟关系,势必对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带来更多不安定、不确定性因素。

第三,“反击能力”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对东亚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构成严重威胁。一个曾经发动过侵略战争的国家,如今又通过拥有“反击能力”进行重新武装,这将会对周边

地区和国家造成严重心理冲击。日本通过着力渲染“地区威胁论”，给自身打造一个面对紧迫威胁而不得不出于自卫才进行“反击”的无辜形象。而“反击能力”的危险性恰恰就在于会以“自卫”的名义引发战争危险。^[21]在制造“潜在敌意”方面，与2013年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相比，2022年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将中国由“国际社会的关切事项”确定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将日本和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的表述改变为“严重关注的问题”。关于朝鲜的表述从“严重威胁”改为“更严重和紧迫的威胁”。并指出朝鲜的核与导弹相关技术及运用能力快速发展，“对于日本安全保障而言，相比以往是更加重大且紧迫的威胁”。原本被定位为“合作伙伴”的俄罗斯被改为“强烈的安全关切事项”。并强调了俄乌冲突动摇了国际秩序的根基，在欧洲方面被视为安全保障上的最重大且直接的威胁。^[16]可以说，日本2022年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渲染周边威胁，制造冲突话题，为拥有、行使“反击能力”寻找借口。尤其是，以“台湾突发事态”或波及日本为由强调危机感，使得基于“和平宪法”第九条的“专守防卫”严重受到很大冲击，^[40]并危及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与此同时，随着日本大举购买进攻性武器、将部队向“西南诸岛”派驻，以及日美关系的紧密化，将会对周边国家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进一步加剧地区地缘冲突风险。

五、结语

尽管日本2022年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将“反击能力”定义为以“自卫”为目的摧毁他国疆域内导弹基地等的的能力，但“自卫”的名义掩盖不住其“攻击性”的本质。二战后历届日本内阁虽强调“自卫权”，但大体上坚持了基于“和平宪法”而不拥有“反击能力”的立场。但这一立场被岸田内阁彻底改变，实现了日本安保战略“质”的转变。其敢于改变既往方针的借口就是“朝鲜和中国的导弹技术进步”。^[41]也就是说，如今日本为明确拥有“反击能力”，不断制造威胁、恐惧和冲突，渲染地区威胁论，充分透露出拥有“反击能力”对华的针对性。日本在新版“安保三文件”中将中国定位为“迄今最大战略挑战”，完全背离了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精神。尤其是，日本政客宣称的“台湾有事即是日本有事”，刻意炒作台海紧张局势，将中日关系推向恶化乃至对立，给整个东亚和平发展、区域经济合作造成很大负面影响及不确定性。

战后以来的“和平宪法”及其“专守防卫”原则，制约着日本再次发动侵略战争。但从“安保三文件”中可以看出，日本并不愿继续接受战后安排，力求建立和行使“反击能力”，提高防卫力，就是为了突破基于“和平宪法”的“专守防卫”原则，改变“战后体制”，加快推进“政治军事大国化”。随着日本防卫实力的提升，势必会危及东亚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参考文献

- [1] 船田中防衛庁長官による総理大臣答弁の代読. 第24回国会衆議院内閣委員会議録第15号[EB/OL]. <https://kokkai.ndl.go.jp/simple/disPDF?minId=102404889X01519560229#page=1>, 1956-02-29.
- [2] 上村健太. 反撃能力の可能性と限界[EB/OL]. <https://www.yomiuri.co.jp/choken/kijironko/ckworld/20230125-OYT8T50066/>, 2023-01-31.

- [3] 岩田清文, 島田和久. 戦略を実行してこそ 目的は達成される[J]. 正論, 2023(3): 47, 52, 53.
- [4] 防衛省・自衛隊. 防衛白書昭和45年版[EB/OL]. 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1970/w1970_00.html, 2023-12-29.
- [5] 潘俊峰. 日本军事思想研究[M]. 北京: 军事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371.
- [6] 刘江永. 战后日本国家战略演进及岸田内阁战略走向[J]. 东北亚论坛, 2022(1): 17.
- [7] 専守防衛と非核三原則から脱却を[J]. Voice, 2023(3): 106, 108.
- [8] 反撃能力保有 識者に聞く[N]. <https://www.hiroshimapeacemedia.jp/?p=126515>, 2022-12-17.
- [9] 日高官就行使反击能力称不排除“饱和攻击”[N/OL]. 共同社, <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23/03/59ae8fed4745.html>, 2023-03-10.
- [10] 萩生田光一. 防衛費2%は待ったなし この国をいかに守るか[J]. 文藝春秋, 2023(2): 272.
- [11] 自民「敵基地攻撃能力」の名称を「反撃能力」に変更案を了承[EB/OL]. <https://www.nhk.or.jp/politics/articles/lastweek/81486.html>, 2022-04-21.
- [12] 反撃能力、憲法に違反せず[EB/OL]. <https://www.komei.or.jp/komeinews/p268323/>, 2022-12-08.
- [13] 日本朝野政党討論対敵基地攻撃能力[EB/OL]. <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22/10/137069be203f.html>, 2022-10-16.
- [14] 岸井雄作. 防衛財源、産経も「増税支持」元外交官、元自衛隊幹部のからの鋭い指摘光る[EB/OL]. <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s/137171093123fc462b1dc78b7f329a81aace8995>, 2023-01-02.
- [15] 日本科学者会議.(決議)憲法違反の新安全保障3文書の閣議決定と日米共同声明に抗議する——この平和への危機に立ち上がる[J]. <https://jsa.gr.jp/d/statement/20230131anpo>, 2023-01-31.
- [16] 防衛省. 国家安全保障戦略[EB/OL]. https://www.mod.go.jp/j/policy/agenda/guideline/pdf/security_strategy.pdf, 2023-01-15.
- [17] 防衛省. 令和5年版防衛白書パンフレット[EB/OL]. https://www.mod.go.jp/j/press/wp/wp2023/pdf/DOJ2023_Digest_JP.pdf, 2023-01-15.
- [18] 福好昌治. 戦略三文書を読む「前編」[J]. 軍事研究, 2023(3): 51.
- [19] 稲葉義泰. 日本の最新ミサイル防衛態勢「IAMD」[J]. 軍事研究, 2023(6): 65.
- [20] 山形大介. 注目すべきは「継戦能力強化」スタンド・オフ・統合ミサイル防衛・無人機 これが日本を守る新装備だ[J]. 軍事研究, 2023(3): 57.
- [21] 福田護. 改めて問う「反撃能力」保有の違憲性[J]. 世界, 2023(5): 95, 94, 93, 95.
- [22] 阪田雅裕. 敵基地攻撃能力と安保法制[J]. 世界, 2022(4): 60.
- [23] 许光建. 联合国宪章诠释[M].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9: 37, 39, 49.
- [24] 竹下能文. 安倍首相、敵基地攻撃能力を念頭に談話 次期政権に議論促す[EB/OL]. <https://jp.reuters.com/article/japan-abe-idJPKBN262196>, 2020-9-11.
- [25] 印象操作? 「敵基地攻撃能力」→「反撃能力」 批判回避の名称変更までも 歴代の政権は保有を否定[EB/OL]. <https://www.tokyo-np.co.jp/article/220375>, 2022-12-16.
- [26] 渡辺利夫. 安保三文書と福澤諭吉[J]. Voice, 2023(3): 246.
- [27] 青井未帆. 安保三文書改定と私たちの平和構想力[J]. 世界, 2023(5): 66-67.
- [28] 迈克尔·多伊尔. 先发制人: 国际冲突的先制与预防[M]. 吴迪, 高连兴, 译.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9: 93-94, 95.

- [29] 和田哲郎. 防衛費の大幅拡大で日本はどうか[J]. 世界, 2023(5): 111.
- [30] 田中均. 「反撃能力」は日本の国力を本当に強くするのか、安保政策大転換で考えるべきこと[EB/OL]. <https://www.jri.co.jp/page.jsp?id=104199>, 2022-12-23.
- [31] 理查德·内德·勒博. 和平与战争之间: 国际危机的性质[M]. 赵景芳,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41.
- [32] 千々和泰明. 安保三文書を徹底解剖する[J]. Voice, 2023(3): 67.
- [33] 憲法解釈変更を閣議決定 集団的自衛権の行使容認[EB/OL]. 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NASFS0103O_R00C14A7MM8000/, 2014-07-01.
- [34] 田嶋慶彦. 「ウクライナは明日の東アジアかも」岸田首相の主張、その思惑は?[EB/OL].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R2Q6RTYR2FUTFK00Q.html>, 2023-02-23.
- [35] 岸田首相、防衛大卒業式で訓示「今日のウクライナは明日の東アジアかもしれない」強い危機感示す[EB/OL]. <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s/b28b8ba6cc65d3ef2ca43f0e99639c8976497cab>, 2023-03-26.
- [36] 外務省. G7 広島サミット(概要)[EB/OL]. https://www.mofa.go.jp/mofaj/ecm/ec/page4_005920.html, 2023-05-26.
- [37] 新安保战略称中国军事动向是最大挑战[EB/OL]. <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22/12/2309ddb8fab3.html>, 2022-12-16.
- [38] 美国支持日本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EB/OL]. <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22/09/26e599e0607a.html>, 2022-09-16.
- [39] 日本政府方针写入日美共同发动反击能力[EB/OL]. <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22/11/3638f05e2852.html>, 2022-11-26.
- [40] 安保法施行满7年, 日本将拥有反击能力[EB/OL]. <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23/03/9486c12dc2b5-7-.html>, 2023-03-29.
- [41] 日本内阁会议敲定3份安保文件[EB/OL]. <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22/12/f0478a517498-3.html>, 2022-12-16.

[责任编辑 许佳]

ABSTRACTS

From "Exclusive Defense" to Improving "Counterattack Capability": The Qualitative Change and Impact of Japan's Security Strategy *LV Yao-dong WANG Fang · 3 ·*

Abstrac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s long pursued the security policy of "exclusive defense". However, with the changes in Japan'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the adjustment of its national strategic objectives,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s gradually adjusted "exclusive defense" to a more proactive defense policy from the aspects of its scope, targets, and forces. It eventually turned the self-defense policy of "exclusive defense" into an autonomous offensive defense strategy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unterattack capability", and the "exclusive defense" was completely overthrown. Such a strategic shift lies not only at the structural level, but also at the national level, that is, to break through the principle of "exclusive defense" based on the "pacifist constitution", to change the "post-war system", and to seek political and military power. Japan's erroneous perception of China will exacerbate tens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which in turn will endanger peace and securit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the world at large.

Key Words: Japan;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NSS); Exclusive Defense; Counterattack Capability; Three Documents on Security; Sino-Japanese Relations

Strategic Inertia and the Geopolitical Power-shaping Preferences of Land-based Traditional Powers *QIN Li-zhi · 17 ·*

Abstract: The "geopolitical renaissance" is an important label for the narrative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 among the great power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nd there have been far more initiatives calling for the importance of geopolitics than actual progress in geopolitical research. Although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a great power's rise cannot be attributed solely to sea power or land power, without geopolitical control, the geographic space for a country's rise and development will be greatly reduced.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sea power, the development of sea power by the traditional land power emphasizes more on the role of inertia. If the inertia is insufficient, the development of sea power may be aborted. If the inertia is too large, it may fall into overexpansion. Existing studies have not paid much attention to the geopolitical effects of strategic inertia,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Thucydides Trap" lacks attention to spatial and temporal factors. The strategic choices of great powers are usually influenced by the interaction of systemic, cognitive, and operational strategic inertia. Relying on the neoclassical realism framework of grand strategy analysis, systemic inertia shaped by cross-cutting structural pressures is taken a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Cognitive inertia, which is jointly shaped by strategic culture, strategic motivation, and strategic determination, serves as the mediating variable. Operational inertia serves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and its measures include the speed of strategic tempo and the dynamics of reward structure. An assessment of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geopolitical power-shaping preferences can help increase the strategic margin of error of rising countries in response to geopolitical risks.

Key Words: Strategic Inertia; Land Power; Sea Power; Neoclassical Realism; Strategic Preferences; Empire; Land-sea Integration

The Sino-US Cyber Power Competition: Power Comparison, Perception Impact, and Model Choice

MIAO Zheng-ming XING Yue · 40 ·

Abstract: In the digital age, cyberspace has become a necessary area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different levels of cyber power, and the competition for cyber power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fierce. Cyber power comes from traditional power, but it's not the same as traditional power. The existing researches on cyber power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mainly focus on the theory of power challenge, cyber hegemony, and cyber resource development. Little research regards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hegemonic cyber power, and to analyze the link between cognitive changes and behavioral express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cyber power competition with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has occupied a dominant position and as the main body of cyber power competition, it is also the main body of perception from cyber power impact, while China is a latecomer country in cyberspace, and it is the main body of developing cyber capabilities. Cyber power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mainly based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s ability to develop cyber power" and "the perception of US cyberspace impact". There are four competition models: one: strong technology development, strong impact: multi-dimensional balancing, high intensity; two: weak technology development, strong impact: single-dimensional balancing, high intensity; three: strong technology development, weak impact: multi-dimensional balancing, Low intensity; four: weak technology development, weak impact: single-dimensional balancing, low intensity. The relevant cases are given separately, and the four modes of cyber power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constantly changing and can be transformed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Key Words: Sino-US Relations; Cyber Power; Competition; Perception Impact; Model Choice

International Cognitive Competition: Origins, Action Dimensions, and Logic of Security *YAN Zhan-yu LIU Wen-long · 57 ·*

Abstract: With rapid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he cognitive domain, the technical domain, and the physical domain are deeply interconnected, and the cognitive domain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ndependent field of ac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competition in the cognitive domain among nations is intensifying. Cognitive competi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action dimensions, in which the influence of cognitive domain on the physical domain constitutes cognitive warfare, the